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丁思懿

扬州大学商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摘要

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对于区域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基于2003~2023年的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表明,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的创业活跃度。本研究为评估金融改革政策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完善金融支持创业创新政策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创业活跃度, 金融体制改革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Zone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evels

Siyi Ding

Business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April 17, 2026; published: May 18, 2026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form pilot zon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form pilot zones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form pilot zon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reform policies and offers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policy system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Zon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以创业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建设，从顶层设计到政策落地持续发力，不断健全创业扶持体系、优化创业服务保障、强化风险支撑能力，同时对灵活就业与各类新就业形态加强规范引导与权益保障，着力破除创业准入、融资支持、经营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创业活动营造出稳定可预期、积极有活力的政策环境与制度保障。创业不仅能够带动地区经济活力，更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外创业存在部分新业态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推进国家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创业活跃度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高民生福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层面多次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金融改革创新，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强化对创业投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综合试验区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先行先试再到经验复制的政策使命，通过系统施策，着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降低创业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在国家政策持续推动，金融改革试点不断扩围深化的背景下，系统评估金融综合试验区设立这一国家级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真实影响与政策效果。这既是对国家金融改革政策落地成效的科学检验，也事关后续金融支持创业创新政策体系的优化完善，具有鲜明的国家政策导向与宏观实践背景。

2. 文献综述和假说

创业活动是驱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与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而金融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其发展水平与改革进程对创业行为的作用始终是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核心议题。跨国实证研究普遍验证了金融发展对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Dutta 与 Meierrieks (2021) [1]以 136 个国家 2004~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多维度金融发展指数，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因果促进作用，其核心机制是满足创业者的融资需求与投资者的风险管控需求，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完善的国家更为突出。Beck 等(2015) [2]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外部融资可及性与农户创业决策、微型企业初始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证实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有效推动农村微型创业活动，同时指出非正式金融在正规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对微型企业销售增长具有显著支持作用，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供给缺口。

中国的金融改革以“市场化导向、渐进式推进”为核心特征，从早期的金融机构改革、利率市场化试点，到近年来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数字金融改革深化，逐步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小企业与个体创业者为创业主体，但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依然突出。在此背

景下，国内研究聚焦中国特色金融改革路径，重点探讨金融改革对创业的赋能效应，形成了贴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杨佳等(2022) [3]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居民收入调查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改革显著提高个体创业概率，核心机制为缓解创业融资约束，尤其利好低收入群体与传统金融薄弱地区；同时研究发现存在数字鸿沟，对老年人、低教育群体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弱。田鸽等(2023) [4]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改革依托技术赋能形成普惠化服务延伸，对创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总体效应。

创业活动的展开依赖于初始资本积累，然而创业者自有资产往往难以覆盖启动成本与运营支出，外部融资成为关键支撑。但传统信贷市场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规模歧视与风险歧视的双重挤压：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难以识别项目质量，抵押品缺失又加剧了信贷风险，最终形成典型的信贷配给均衡(Buera等, 2015) [5]。这种市场失灵使得大量潜在创业者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创业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商事行为(Beck and Demircuc-Kunt, 2006) [6]。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本质上是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打破这种低效率均衡。试验区政策并非简单的金融规模扩张，而是通过利率市场化、机构多元化与产品创新三重路径，重构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具体而言，试验区推行的普惠金融政策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显著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搜寻成本与风险评估成本(Sanga and Aziakpono, 2024) [7]，使得原本被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长尾客户获得信贷准入资格。与此同时，政策性担保体系的建立与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创新，实质上是对银行信贷配给行为的一种外部激励修正，缓解了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惜贷情绪(韩瑞栋和薄凡, 2020) [8]。

尽管国内外研究对于金融发展对创业的影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但对于多集中于宏观经济水平对于创业的影响，针对制度性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于创业的影响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就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制度性的金融供给侧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对于政策实施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旨在弥补这一研究方向的短板，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金融综合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3. 实证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评估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因果效应。为了检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根据上文假设，以创业活跃度(*entre_act*)为被解释变量，DID交互项(*did*)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GDP对数(*Lnpgdp*)、城镇化率(*Urban*)、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移动电话普及率(*Mobile*)、政府干预(*Gov*)、产业结构(*Industry*)、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entre_act_{it} = \alpha + \beta \cdot DID_{it} + \gamma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entre_act_{it}*为城市*i*在*t*年的创业活跃度指数；*DID_{it}*为核心解释变量，当城市*i*在*t*年及之后已属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时取1，否则取0；*X_{it}*为一组控制变量；*μ_i*和*λ_t*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系数*β*反映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如果系数*β*显著大于0，则表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业活跃度，进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3.2. 变量选取与说明

3.2.1. 核心被解释变量

在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测度与量化方面，借鉴白俊红(2022) [9]、韦施威等(2025) [10]所使用的创业活跃度测度指标，选取地级市层面每百人新注册企业数作为核心代理变量，用以衡量城

市创业活跃度。其核心原理在于：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口规模、行政层级与经济体量差异，若直接采用各城市年度新注册企业绝对数量来评估创业活跃度，会因人口基数差异带来明显的测度偏误。一方面，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天然具备更高的市场需求、要素集聚能力与创业主体基数，新注册企业总数通常更高；另一方面，新注册企业数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强的直接关联，单纯比较绝对数量无法真实反映城市间创业活跃程度的差异。因此，为剔除人口规模带来的干扰与规模效应，实现不同城市之间创业活跃度的横向可比，本文采用相对指标进行测度，即以各城市当年新注册企业数量除以对应年末常住人口规模，构造每百人新注册企业数，以此更准确地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水平。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来构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为 DID 交互项，基于渐进双重差分设计构建。处理组为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城市，对应温州市(2012 年获批)、泉州市(2012 年获批)、珠三角相关城市(2012 年获批)，以及后续获批的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江西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福建省逐个获批的地级市。当该城市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年份，did 取值为 1，否则为 0。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因素众多，从地区经济特征、金融环境、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等多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均 GDP 对数(*Lnp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Urban*)，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贷款余额与 GDP 之比；移动电话普及率(*Mobile*)，衡量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Industry*)，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外商直接投资额与 GDP 之比。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创业活跃度	<i>entre_act</i>	每百人新创企业数
核心解释变量	DID 交互项	<i>did</i>	金融改革试验区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控制变量	人均 GDP 对数	<i>Lnpdp</i>	不变价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城镇化率	<i>Urban</i>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i>Finance</i>	贷款余额与 GDP 之比
	移动电话普及率	<i>Mobile</i>	移动电话普及程度
	产业结构	<i>Industry</i>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i>FDI</i>	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重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本研究共包含 5771 个观测值，所有连续变量均已在 1% 和 99% 分位处进行了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异常值对最终结果可能出现的影响。创业活跃度指数的均值为 0.962，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距很大，表明地区间差异显著。该变量统计说明样本涵盖了从创业活动极不活跃到高度活跃的不同类型地区，数据变异性较好，有利于识别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且各变量的统计分布特征合理，标准差适中，不存在明显的极端异常值，数据质量良好，适合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key variables**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活跃度	5771	0.962	0.952	0.047	5.744
DID	5771	0.040	0.197	0.000	1.000
城镇化率	5771	0.505	0.172	0.154	0.949
移动电话普及率	5771	0.800	0.488	0.020	2.947
产业结构	5771	41.529	9.915	8.500	83.900
人均 GDP (对数)	5771	10.289	0.829	7.565	12.456
金融发展水平	5771	0.956	0.574	0.276	3.349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5771	0.018	0.022	0.001	0.376

4.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展示了金融综合实验区设立对创业活跃度的回归分析结果。具体而言，列(1)仅加入 DID 交互项，列(2)至列(4)逐步加入控制变量。DID 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对创业活跃度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以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列(4)为基准，DID 系数为 0.177，表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处理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平均提高了约 0.177。这一结果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显著性，表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对创业活跃度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analysis**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VARIABLES	<i>entre_act</i>	<i>entre_act</i>	<i>entre_act</i>	<i>entre_act</i>
<i>DID</i>	0.774*** (13.870)	0.369*** (7.796)	0.244*** (4.566)	0.177*** (3.109)
<i>Urban</i>				-0.168 (-1.183)
<i>Mobile</i>				0.072*** (4.940)
<i>Industry</i>				0.007*** (4.038)
<i>Lnpgdp</i>			0.377*** (31.470)	0.337*** (22.502)
<i>Finance</i>			0.119*** (5.000)	0.046*** (2.610)
<i>FDI</i>				-0.046 (-0.112)
<i>Constant</i>	0.915***	0.931***	-3.063***	-2.837***

续表

	(81.312)	(102.158)	(-26.453)	(-16.502)
<i>Observations</i>	5771	5771	5771	5771
<i>R-squared</i>	0.032	0.401	0.470	0.47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 GDP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业活动越活跃，符合经济发展促进创业的理论预期；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印证了金融供给对创业活动的重要支撑作用；移动电话普及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信息化水平提升或要素流动加速为创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率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未能通过统计检验，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城镇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生活成本和房价越高，可能会对于创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同样不显著，表明外资流入对创业活跃度的直接影响有限。

4.3.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 DID 模型有效识别的前提条件，也是本文稳健性检验的重要内容。首先，构建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将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进行交互，以政策实施前 1 期为基准期，估计各期交互项系数；其次，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判断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趋势差异，若政策实施前各期交互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绝对值较小，说明两组在政策干预前的变化趋势无显著差异；最后，绘制动态效应系数图，直观展示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趋势变化，进一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的合理性。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试验区城市非试验区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发展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沿着趋同的路径演变，而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之后，各时期的效应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 0，说明试验区设立后，处理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与控制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差距逐步拉大，进一步印证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所带来的正向冲击效应，证实了试验区的设立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具有真实可靠性。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创业活跃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为避免单一指标度量方式可能带来的测量误差，验证结论对被解释变量定义的敏感性，本文进一步采用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使用新创企业数量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该指标侧重于反映创业规模的总量特征。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当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新创企业数量对数时，DID 系数为 0.0704，替代指标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无论采用综合指标还是单一数量指标度量创业活跃度，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促进效应均显著存在，研究结论不受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的影响。

(3) 排除直辖市

为避免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因特殊政治经济地位、行政资源配置及政策先行优势可能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验证研究结论是否受特殊样本点驱动，本文进一步采用剔除直辖市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四个直辖市从处理组和对照组中剔除后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4 列(2)所示，当排除直辖市样本后，DID 系数为 0.1725。该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高度接近，差异不足 0.005。这表明，在非直辖市的普通城市样本中，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

促进效应依然稳健存在，研究结论不受直辖市特殊样本的影响。

(4) 缩短样本期

为检验政策效应是否受样本时间跨度或特定年份极端值的影响，验证研究结论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缩短样本期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原样本期缩短为 2012~2020 年，以排除样本初期或末期潜在的政策预期效应或外部冲击干扰。回归结果如表 4 列(3)所示，当样本期缩短为 2012~2020 年时，DID 系数为 0.1347。该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虽幅度有所减小，可能由于样本量减少所致，政策促进效应依然明显。这表明，在缩短的时间窗口内，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依然稳健存在。

(5) 保留核心经济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纳入了城镇化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产业结构、人均 GDP、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多维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为避免控制变量过多可能导致的过度控制问题，以及检验研究结论是否由特定控制变量组合所驱动，本文进一步采用保留核心经济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在剔除部分非核心控制变量后，仅保留人均 GDP、金融发展水平等对创业活动具有直接理论关联的核心经济变量，以验证政策效应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4 列(4)所示，当仅保留核心经济变量时，DID 系数为 0.2450。该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政策效应甚至略有增强。这表明，无论采用全样本控制变量还是仅保留核心经济变量，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促进效应均显著存在，研究结论不受控制变量选择范围的影响。

(6) 调整聚类层面

为检验标准误聚类方式对统计推断结果的影响，验证研究结论是否受聚类层面选择的干扰，同时，为验证基准结果是否受空间相关性与政策扩散效应的干扰，本文改变基准回归中的聚类方式，将聚类层面由城市层面调整为省级行政单位层面，重新计算稳健标准误以验证系数的显著性。回归结果如表 4 列(5)所示，当调整聚类层面后，DID 系数为 0.1764。该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更关键的是，该系数估计值与以城市层面聚类的基准回归报告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数值差异不足 0.001，表明政策效应并未因聚类方式调整而发生实质性偏移。系数大小的高度一致性排除了“城市层面空间相关性导致虚假显著”的可能性，证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并非由省内城市间的协同波动或共同冲击所驱动，而是真实反映了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进一步证实政策效应的显著性在不同聚类方式下均保持稳健。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	(2)	(3)	(4)	(5)
	新创企业对数	排除直辖市	缩短样本期(2012~2020)	保留核心经济变量	调整聚类层面
<i>DID</i>	0.0704*** (0.0240)	0.1725*** (0.0360)	0.1347*** (0.0393)	0.2450*** (0.0535)	0.1764** (0.0773)
<i>Constant</i>	-1.3571*** (0.1528)	-2.5016*** (0.1143)	-2.8822*** (0.2764)	-3.5030*** (0.1323)	-2.8313*** (0.3571)
<i>Observations</i>	5771	5771	5771	5771	5771
<i>R-squared</i>	0.7635	0.7060	0.5837	0.4711	0.4752

尽管本文采用了以上稳健性检验的方法以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行性与稳健性，但由于试验区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未来可以考虑尝试使用 PSM-DID、工具变量法或合成控制法等更前沿的方法

来进一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03~2023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方法,系统考察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活跃度,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并且在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缩短样本区间、改变控制变量组合与调整标准误差聚类层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城市层面证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效激发了市场创业活力,提升了创业活跃度,为科学评估国家金融改革政策成效、健全金融支持创业创新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实证支撑。

5.2.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发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创业创新的长效支撑作用,持续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结合本文实证结论与现实改革需求,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稳步扩大金融综合改革试点覆盖范围,在总结现有试点成效基础上,加快复制推广普惠金融服务、风险分担机制、信用体系建设等成熟经验,推动金融改革红利由试点区域向更广范围延伸。第二,聚焦初创企业与小微创业者面临的融资约束痛点,持续创新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等适配性金融产品,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与风险补偿机制,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创业主体的可得性与便利度。第三,立足区域资源与发展差异实施差异化金融支持策略,针对不同城市、不同产业、不同创业类型精准施策,提高政策靶向性与落地成效。

基金项目

扬州大学商学院 2024 年度研究生实践创新项目。项目名称: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地区创业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SXYJSCX202439。

参考文献

- [1] Nabamita, D. and Daniel, M. (2021)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73**, 114-126. <https://doi.org/10.1016/j.iref.2021.01.002>
- [2] Beck, T., Lu, L. and Yang, R. (2015) Finance and Growth for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67**, 38-56.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4.10.008>
- [3] 杨佳, 陆瑶, 李纪珍, 等.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 2022, 25(11): 43-68.
- [4] 田鸽, 黄海, 张勋. 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23(3): 74-92.
- [5] Buera, J.F., Kaboski, P.J. and Shin, Y. (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Frictions: A Macro-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 409-43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614-115348>
- [6] Beck, T. and Demirguc-Kunt, A. (2006)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Access to Finance as a Growth Constraint.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 2931-2943. <https://doi.org/10.1016/j.jbankfin.2006.05.009>
- [7] Sanga, B. and Aziakpono, M. (2024) FinTech Developments and Their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Digital Finance for SMEs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47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17**, 127-155. <https://doi.org/10.1108/JEEE-09-2023-0379>
- [8] 韩瑞栋, 薄凡. 区域金融改革能否缓解资本配置扭曲?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0(10): 14-23.
- [9] 白俊红, 张艺璇, 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6): 61-78.
- [10] 韦施威, 潘爽, 高锡蓉, 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活跃度——兼论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J]. 南方经济, 2025(7): 98-118.